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 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宋弘封进杨婉彧

内容提要：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评估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保缴费率政策。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社会经济影响，而非缴费率下调的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创新性地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并且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这意味着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另一方面，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并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景下，社保降费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信心的预期。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前新一轮全国层面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关键词：社保缴费率下调 企业参保 劳动力雇佣 工资

一、引言

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长期以来，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重的现实一直困扰着我国企业发展，20%的企业缴费率高于大多数OECD国家，减税降费是激发企业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举措（白重恩，2019）。另一方面，缴费率对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老龄化背景下，降低社保费率叠加人口老龄化或将产生养老金缺口的担忧。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养老金本身，更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从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省份可降至16%，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①这一政策的出台引起了企业与公众广泛的关注，其政策初衷在于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激发经济活力。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占据主要部分，以往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是20%，个人缴费比例是8%，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支出。此次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其目的在于大幅度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以期

* 宋弘（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songhong@fudan.edu.cn；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jfeng@fudan.edu.cn；杨婉彧，东北财经大学高等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116025，电子信箱：wanyu.yang@dufe.edu.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74036, 7180302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2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076）的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详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04/content_5379629.htm。

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用工,对当前国家提出的稳就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精准系统评估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企业社保缴费直接关系到社保基金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高额的税费负担已影响到企业日常经营和活力。社保降费政策能否在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这是当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2012年开始的养老保险缴费统筹改革为切入点,聚焦探讨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的效应。特别地,本文在系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如下核心但却尚未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第一,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参保与社保总缴费有怎样的影响。第二,缴费率下降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第三,考察缴费率下降效应的异质性,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系统回答,深入了解企业社保缴费税负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更为当前正在推进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改革提供经验与启示。

然而,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现有文献普遍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社保缴费率的地区差异本身不是外生的,缴费率不同的地区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而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可能会对企业行为与决策造成影响,从而导致最小二乘回归(OLS)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即估计结果并非来自于缴费率差异其本身。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浙江省2012年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这一相关政策评估的重要方法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缓解不可能观测因素对于实证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

另外一大挑战来自于企业数据本身。已有社保缴费率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地区层面宏观数据(刘军强,2011)或上市公司数据(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也有研究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唐珏和封进,2019a,2019b)。以上数据的局限在于上市公司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包括的数据均为上市公司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与此同时,社保负担较重的往往是中小企业,社保缴费逃费行为也是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明显,因此社保相关政策效果的考察应该将这一类企业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具有代表性的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这一数据包括了2007—2015年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企业信息,既包括规模以上企业,也包括抽样的中小民营企业。特别地,这一数据具有丰富的企业层面信息,包括社保参与、社保总缴费金额、企业职工人数等等。由此,我们得以全面、系统、精准地考察社保局缴费率下降对各种类型企业、多个维度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克服前述两大研究挑战的基础上,本文稳健地发现:第一,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且参与率的提高在各类型与各种规模的企业均稳健的存在。第二,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缴费总支出,这意味着降费率有助于实现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第三,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提高了企业招工激励与意愿。而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降费统筹政策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分迸发。此外,进一步分析也表明,缴费率下降显著降低了职工平均工资,这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以上结果在当前具有非常鲜明的政策含义,这意味着社保缴费率下降提高了企业社保参与,保证了社保基金收支平衡、促进社会公平、增加就业,在短期内或是应对经济下行、稳定就业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意味着社保降费政策需要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稳定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证证据支撑和有益启示。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和评述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本文的创新;第三部分介绍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政策的相关背景机制;第四部分介绍本文实证研究数据,并设定计量回归模型,讨论识别策略;第五部分报告主要实证结果;第六部分对实证模型有效性的关键假

设和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七部分进一步考察其影响的异质性,并作出进一步分析;第八部分总结全文,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本文创新

已经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社保缴费率与企业社保参与的关系。中小民营企业并不必然遵守社保缴费政策,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社保缴费(Bailey & Turner, 2001; 封进, 2013)。赵静等(2016)发现在较高的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企业参保概率显著降低,但职工参保概率不受影响;封进(2013)采用2004—2007年四个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制造业参加社会保险的内在激励,发现随着政策缴费率的增加,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呈现先上涨再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关的,也有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支出占GDP比重造成了负面影响(封进等, 2010),个人账户空账化、养老保险回报过低等因素也会降低社保缴费动机(赵耀辉和徐建国, 2001)。近年来,也有文献考察征收机构改革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刘军强, 2011; 郑春荣和王聪 2014; 唐珏和封进, 2019a)。此外,部分基于国外背景的研究发现,行业特征和声誉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缴费行为(Nyland et al., 2006, 2011)。

另外,也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社保缴费对其他企业行为,尤其是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国外相关的研究较为丰富且相关结论在不同国别间差别较大。Kugler & Kugler (2009)利用哥伦比亚数据发现,社会保险费用提高会导致正式就业概率下降,且这种效应在制造业更明显。Kodama et al. (2015)使用日本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当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提高后,企业会通过减少雇员数量和提高员工平均工作时间作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

国内相关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结果。已有研究考察了社保缴费对于员工薪酬(封进, 2014)、劳动力雇佣(马双等, 2014)、企业生产率(赵健宇和陆正飞, 2018)的影响。也有研究考察了养老金征收机构改革对社保基金收入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唐珏和封进, 2019a, 2019b),以及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景鹏和郑伟, 2019)。例如,马双等(2014)利用地区养老保险缴费率作为社会保险费缴费的工具变量,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会减少企业雇佣人数,并且低收入员工受到冲击更大。^①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创新:

第一,从研究问题与关注变量的维度:已有文献关注的维度大多比较单一,重点研究单一的关注社保缴费率对企业社保缴费或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少有研究在同一框架下同时考察参保和雇佣行为。众所周知,社保缴费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多重性的特点,将多个维度的变量纳入考量的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对这一政策进行评估。特别地,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背景下,如何制定企业社保缴费政策以激发企业活动,同时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已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从关注企业样本的维度:已有文献大多使用宏观数据(刘军强, 2011),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数据(赵静等, 2016; 唐珏和封进, 2019)或上市公司数据(赵健宇和陆正飞, 2018)。以上数据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保政策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在经济下行期也面临更多的困境与转型需求,同时,较之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也有更明显的逃避社保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具有代表性企业样本的全国税调数据:既包括了重点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更是包括了抽样的中小民营企业,从而得以将众多中小企业纳入考察

^① 与本文相关的,也有丰富的研究探讨了各种类型的减税降费激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王伟同等(2020)、杨国超等(2017)。

的范围,为已有研究作出了样本维度上的补充。

第三,从减税降费政策含义相关的维度:大部分文献关注的变量是社保缴费率本身,且关注时间范围在2010年之前。换言之,大多已有文献研究的是“高社保缴费率效应”,而非“社保缴费率下调效应”。自2015年起,我国社保缴费率经历了若干次小幅下调,2019年5月1日开始的全国性的下调幅度更是社保改革以来之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2012年的缴费统筹为切入点,并将研究数据区间限定为2007—2015年,创新性地关注了“社保缴费率下调”的政策效应,从而为正在面对的全国性的缴费率下调政策提供实证证据,因此具有更为鲜明和直接的政策含义。

三、制度背景

降低社保缴费率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较高的社保缴费率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税费占营收比重仍然偏高,“五险一金”缴费过高已成为企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已经经历过多次下调,但中国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依然高于大多数国家,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9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企业缴纳比达到了20%,对比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和日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分别为6.2%和7.5%,大部分OECD国家企业缴费率均低于10%。^①过高的企业税负和社保费率已经让企业倍感压力。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会增加企业的逃税行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逃避社保缴费行为,根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的估算,在被调研的2000多家企业中,社保缴费基数合规的占比仅27%。过高的社保缴费率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逃避行为,这也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4月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最大一次降费于2019年5月1日启动。这一降费切实降低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现有省份养老保险缴费率由20%或19%,降至16%,降低了4个百分点,相当于原有缴费率的1/5。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起,我国社保费率已经有过5次全国性的下调措施,不过下调幅度均较小且属于暂时性的下调;而2019年5月实施的降费新政,社保降费力度降幅尤其大,且属于长期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实体经济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国家尚未统一调降社保费率的情况下,此前已经有不少省市开始了自己的实践。2012年起,浙江统一了全省用人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14%;2015年,广东也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统一为14%。除此之外,山东和福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也统一为18%,低于国家统一规定的19%—20%。具体地,2008年11月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09年起,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分年度下调将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②自此,浙江省各市陆续出台相关规定分年度逐渐下调缴费率,但各地区调整幅度与覆盖范围存在一定差异,下调幅度有限,且大多表述为“暂时性下调”,并分年度逐步推进。更进一步地,直至2011年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的通知》规定,^③从2012年1月1日起,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全省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正式统筹统一为14%。缴费基数继续按原有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执行,即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缴费基数

① 各国社保缴费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 Pensions 数据库。

②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仍统一按20%执行。详见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此之前,全省企业缴费率统一为20%。

③ 具体文件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的通知》, http://www.zj.gov.cn/art/2013/1/4/art_13012_69329.html。

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确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缴费基数按参保职工工资总额确定。^①

本文利用浙江省社保缴费下降为政策实验,采用企业数量庞大、且包含大量中小企业的税收调查数据,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包括企业社保参与、社保实际缴费,以及企业劳动力雇佣行为等。已有文献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效应,尚未有研究关注中国缴费率下调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少有研究系统全面考察对多维度企业行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系统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对现有学术文献有效的补充与拓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全面理解2019年5月起开始执行的社保缴费率下降带来的可能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为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提供经验启示和建议。

四、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与关注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为2007—2015年度国家税收统计调查数据库(National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NTSD,简称税调数据),这一数据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共同负责,每年全国大约有70万家企业接受抽样调查,包括重点企业、大中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覆盖了所有的企业类型。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抽样企业报告的全部税单占2014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75.7%,已有丰富的研究利用税调数据考察中国企业行为,例如Liu & Mao (2019)、Fan & Liu (2020)、高培勇和毛捷(2013)、毛捷等(2014)等,数据的可信度与代表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证实。^②

具体来说,抽样企业需要填写三份表格。第一个表单为企业基本信息表单,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名称、地址、所有制类型、行业、开业时间等。第二份表单为商品和服务形式信息表,包括企业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平均价格、产品数量及其国内和出口市场销售总额等。第三份表单为公司财务及税务信息,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报表、现金流量表等。值得一提的是,与本文研究设定密切相关的,第三份表单中还包含了企业职工人数、缴纳社保情况,包括是否参与社保缴费、缴费总金额等信息。

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表1报告了主要关注变量的统计描述,具体关注的结果变量包括企业社保参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企业职工人数。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结果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1)	(2)	(3)
社保参保(虚拟变量)	0.744	0.437	780313
社保缴费支出(千元,对数)	4.860	2.584	672911
企业雇佣总人数(人,对数)	3.940	1.620	771504
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年)	8.605	16.896	771148
制造业(虚拟变量)	0.350	0.477	780313
民营企业(虚拟变量)	0.426	0.494	780313

^① 本文主回归分析中主要关注2012年初开始的正式统筹降费,这是考虑到此前各地降费分年度逐步推行,降费幅度和覆盖范围有限、差异较大。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和2010年度开始的降费,大多表述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暂时性下调”而非“长期调整”,由此企业行为改变的动机可能较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有更具体说明。

^② 税收调查数据全样本是每年70万家企业左右,针对中小企业每年抽样调查,本文采用的总样本量为78万家,这是因为本文主回归使用的是浙江省和江苏省2007—2015年间的数,这两个省份在2007—2015年间总样本约为78万家。

(二)实证方法设计

为了解决文献中普遍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浙江省2012年起开始的社保缴费费率下调统筹作为“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倍差:第一层差异来自省份层面,第二层差异来自年份层面。考虑到社保降费仅在浙江省执行,我们在基准分析中采用与浙江省各方面特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较为相似的江苏省作为控制组;^①因此,本文双重差分法所比较的是浙江与江苏的企业在社保降费政策执行前后的相关行为差异。计量模型如下:

$$Y_{ipt} = \alpha + \beta Treat_p \times Post_t + X'_{ipt} \phi + \kappa_i + \gamma_t + W'_{pt} \cdot f(t) + \varepsilon_{ipt} \quad (1)$$

其中, i, p, t 分别表示企业、省份与年份, $Treat_p = 1$ 表示浙江省的企业,反之, $Treat_p = 0$ 表示江苏省的企业。由于在本研究设定中,降费政策仅在浙江省执行,本文选择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较为接近的江苏省作为对照组,以增加可比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对于对照组省份选择是稳健的; $Post_t$ 表示政策前后时间的虚拟变量, $Post_t = 1$ 表示2012年或之后; Y_{ipt} 是一系列关注的结果变量,包括社保参与、社保总缴费支出,以及企业雇佣人数等;回归方程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以分别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对结果估计的影响,以及时间层面的波动,比如宏观金融形势变化、宏观政策变化等对结果估计的影响; X'_{ipt}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所属产业类型;^②为了进一步控制省份间原有的差异,方程中进一步加入降费开始之前(即2011年)省份层面的特征 W_{pt} (包括省份层面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产量、FDI、人均GDP)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最后,采用聚类在企业层面的标准误。

五、实证结果

(一)企业社保参保和社保缴费支出

首先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参与与社保总缴费支出的影响,表2列(1)—列(2)报告了缴费率下降对社保参与的影响,其结果变量为企业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所有回归方程式中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省份层面2011年基准特征与时间趋势交叉项,^③列(2)在此基础上继续控制了企业控制变量。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参与,提高约4.2%,考虑到控制组企业平均参与社保概率为70%,这一结果表明缴费率下调提高了社保参与约6个百分点。

表2列(3)—列(4)报告了缴费率下调对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的影响,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缴费总支出。这一结果表明,虽然这一政策降低了企业平均缴费率,但是由于企业参保概率的增加及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增加(详见下文结果),^④反而提高了社保缴费总额。这一结果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当前我国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制定企业社保缴费政策以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更是重大政策挑战。以上结果意味着当前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有助于实现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

① 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采用浙江省相邻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重复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具体结果在下文稳健性检验部分报告。

② 考虑到控制变量可能带来的 bad control 问题的担忧 (Angrist and Pischke, 2008),主回归中加入的企业-年份层面的控制变量较少,进一步加入了 $Baseline\ control * f(t)$ 控制基准年份的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③ 此处时间趋势 $f(t)$ 采用最为严格的年份虚拟变量。

④ 此处企业参保的增加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参保企业数量的增加,二是来自于各企业内部参保员工数量的增加。由于数据中未包含企业参保员工数量的信息,此处暂时无法区分两个来源分别贡献比例的多少。

表 2 社保费率下降与企业社保参保

	社保参保		社保缴费总额(log)	
	(1)	(2)	(3)	(4)
<i>Treat_post</i>	0.0430 *** (0.00477)	0.0423 *** (0.00482)	0.158 *** (0.0236)	0.162 *** (0.0238)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 f(t)</i>	Yes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观测值	780313	771148	672911	665082
R ²	0.706	0.708	0.839	0.841

注: $Treat_post = Treat_p \times Post_t$, $Baseline\ control * f(t)$ 为省份层面 2011 年基准特征(包括省份层面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产量、FDI、人均 GDP)与时间趋势交叉项;采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企业劳动力雇佣

接下来考察社保费率下降对企业员工雇佣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利用税调数据中企业年末职工人数的信息,考察社保费率下降如何影响企业雇佣规模。表 3 报告了相关结果,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招工规模约 5.6%,且在 1% 统计意义上显著;结合控制组平均值为 192 人,表明缴费率下降平均提高每个企业多招 10.8 人。这一结果也是符合预期的,社保费率下降意味着企业招工成本下降,提高了企业招工激励。以上结果意味着社保费率下降在保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显著增加了劳动力雇佣、提高了就业水平,在短期内或是应对经济下行、稳定就业的有效措施。

表 3 社保费率下降与企业劳动力雇佣

	企业员工人数(log)	
	(1)	(2)
<i>Treat_post</i>	0.0529 *** (0.0116)	0.0555 *** (0.0117)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 f(t)</i>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观测值	771504	763184
R ²	0.933	0.933

注:结果变量“企业员工人数”为数据库中报告的企业年末职工总人数。

(三)特别讨论:社保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

社保降费对民营企业意义重大,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白重恩,2019)。一方面,民营企业大多具有劳动密集的属性,人力成本是营业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保缴费负担较重,部分企业往往以降低工资的形式将负担转嫁给员工,或逃避参保,或不足额缴纳社保。这不仅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也抑制就业,抑制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情景下,切实减轻民营企业压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局限在中小型民营私

营企业(具体地,定义为人数在 200 人以下的民营或私营性质的企业)并重复上述回归,专注考察社保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结果在表 4 中汇报,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中小民营企业社保参保率约 3.2%,显著提高了社保总缴费额约 13.5%;大幅增加了企业就业规模,达到了 7.4%。值得一提的是,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就业规模扩张效应更为明显。具体地,基于全样本的分析表明提高了总体就业约 5.6%(表 3),基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分析表明提高民营经济就业规模约 7.4%,这表明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 4 中小民营企业相关结果

	社保参保	社保总缴费(log)	职工人数(log)
	(1)	(2)	(3)
<i>Treat_post</i>	0.0316 *** (0.0113)	0.135 *** (0.0468)	0.0744 *** (0.0208)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 f(t)</i>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观测值	292738	248261	292314
R ²	0.807	0.878	0.943

六、实证假设与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针对本文的实证假设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一系列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重要的前提假设是趋同假设(Jacobson et al., 1993; Gentzkow, 2006),即如果没有降费政策,浙江的企业与江苏企业社保参与和职工人数的变化趋势应该都是比较平行的。为了检验这一点,图 1 报告了浙江和江苏企业社保参保和企业职工人数的平均变化趋势。不难发现,在 2012 年降费统筹开始之前,两者的变化趋势是比较趋同的;从 2012 年开始出现差异,尤其是 2014 年起,两地的社保缴费与职工人数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符合平行趋势检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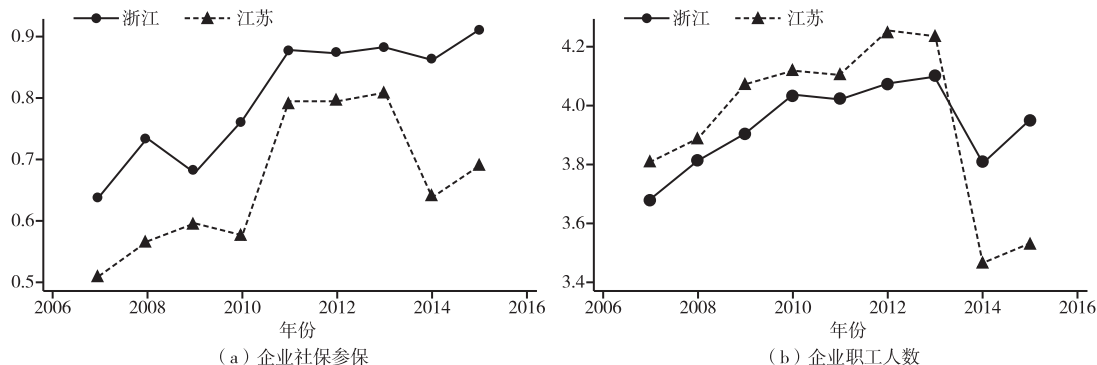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① 此处的平行趋势图使用原始数据作图,从理论上来说,平行趋势检验并不需要加入固定效应,因为选择实证方法的本质思想是为了选择和实验组非常相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在本文双重差分的设定下,是为了证明浙江和江苏的差别在时间趋势上,应该是一致的。换言之,浙江和江苏的企业是相似和可比的,因此未加入任何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时间趋势图就可以检验这一点。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一节针对控制组省份的选择、政策时间的确定、企业固定效应等关键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控制组省份的选择

本文选择浙江省的毗邻省份江苏省作为控制组,主要是考虑到江苏在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产业特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与浙江最为相似。为了保证控制组选择的稳健性,我们又采用浙江省相邻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相似的福建省作为控制组,如表5列(1)—(2)所示,结果依然是稳健的。更进一步地,我们也采用所有与浙江省相邻的省份作为控制组重复回归,结果同样是稳健的。

2. 前期政策的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浙江省在2012年开始进行养老保险正式统筹为切入点。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浙江部分地区的政府已经开始了地区降费,但是降费比例与时间并不统一,大多分年度分步逐渐推进下降,且幅度与覆盖范围并不统一。更为重要地,此前城市层面的缴费率下调官方文件大多表述为“暂时性下调”,并未提出长期下调的预期。由此,从直观上来看,企业行为改变的动机可能也是有限的,直到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现全省层面的下调统筹。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方程式中进一步加入表示2009年之后的虚拟变量($post_{2009}$)与浙江省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表5列(3)—列(4)的结果表明,主要基准系数 $Treat_post$ 一项依然是稳健的,表明虽然此前分步进行的降费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2012年开始统筹下调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到宁波市、台州市、绍兴市或其中的部分县曾在2009—2012年间将费率调整为12%,低于2012年的14%,我们将费率调整曾低于14%的地级市全部剔除,重复回归,如表5列(5)—(6)所示,结果也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一)

	使用福建省作为控制组		政策时间区间		剔除部分城市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1)	(2)	(3)	(4)	(5)	(6)
$Treat_post$	0.0313*** (0.00592)	0.0581*** (0.0149)	0.0423*** (0.00482)	0.0555*** (0.0117)	0.0661*** (0.00487)	0.0826*** (0.0127)
$Treat_post_{2009}$			-0.00486 (0.00526)	0.0301*** (0.00832)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aseline\ control * f(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582315	575414	771148	763184	629698	623539
R^2	0.682	0.922	0.708	0.933	0.709	0.935

注:列(1)—(2)使用福建省作为控制组;列(5)—(6)使用的是剔除了宁波市、台州市、绍兴市的样本。

3. 关于企业固定效应的检验

接下来,针对企业固定效应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所有基准回归中都包括了企业固定效应,这是较为严格的作法,可以控制住诸多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使得估计系数更为精确。但是,从计量估计角度出发,由于我们的兴趣变量是在“省份-年份”

层面,理论上来说只需要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并不是必须的。此外,如果一个企业在2007—2015年间只出现过一次,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就会导致这一企业样本虽然出现在回归中,但是实际上没有贡献到系数估计中去。我们进行了统计,发现17.59%的企业在样本区间仅出现过一次。换言之,这些企业的样本在加入企业固定效应之后,其实是没有贡献到回归中去的。因此,将这些样本剔除重复回归,在表6列(1)—(2)报告,发现结果也是非常相似和稳健的。

进一步地,我们又将企业固定效应剔除,替换为县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并重复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列(3)—(4),结果也是显著的。不过,与加入企业固定效应相比,区县固定效应下的估计系数增加了不少,分别从0.042和0.056增加到0.072和0.079。这样的变化也是符合直觉的,由于与县区层面固定效应相比,企业固定效应包括了更丰富的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在不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可能会被错误的归结到社保降费对缴费的影响中去,导致估计系数的高估。

4. 剔除部分企业

考虑到部分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规模以上外资企业等社保缴费行为本身相对比较规范(封进,2013),我们进一步剔除了这部分企业,发现结果依然是稳健的。^①更进一步地,考虑到部分服务业,比如教育业、金融业、公共服务行业等原本社保缴费较为规范,不易受缴费率下降影响,我们在样本中又剔除了以下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行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业、文化体育业、公共管理业、国际组织等,并重复回归,在表6列(5)—(6)中报告;发现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5. 限定在一直存在的企业

最后,另一个可能的担忧是,上文发现的效应是否有可能来自于企业群体的变化,比如来自于新进入的企业,而对一直存在的企业本身并无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样本局限在2011年或之前就存在的企业,并重复主回归,如表6列(7)—(8)报告的结果,不论是企业参保、还是企业职工人数,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于之前就存在的企业而言,社保降费的效果依然是显著的。

表6 稳健性检验(二)

	剔除只出现过一次的企业		替换企业固定效应为区县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剔除部分服务业企业		剔除新进入企业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1)	(2)	(3)	(4)	(5)	(6)	(7)	(8)
<i>Treat_post</i>	0.0423 *** (0.00437)	0.0555 *** (0.0106)	0.0721 *** (0.00422)	0.0791 *** (0.0137)	0.0765 *** (0.00554)	0.0878 *** (0.0142)	0.0634 *** (0.00522)	0.0698 *** (0.013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No	No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f(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① 由于版面限制,剔除“上市公司、规模以上外资企业”这一回归结果未汇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续表 6

	剔除只出现过一次的企业		替换企业固定效应为区县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剔除部分服务业企业		剔除新进入企业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log)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log)
	(1)	(2)	(3)	(4)	(5)	(6)	(7)	(8)
观测值	635040	629239	771147	763183	501857	500452	597888	592010
R ²	0.628	0.916	0.179	0.267	0.665	0.919	0.656	0.920

注:列(1)—(2)剔除了在2007—2015年间只出现过一次的企业;列(3)—(4)剔除了企业固定效应,加入了县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列(5)—(6)剔除了信息传输、软件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行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业、文化体育业、公共管理业、国际组织;列(7)—(8)将样本局限在2011年或之前就存在的企业。

七、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上文发现表明,从平均效应角度来说,社保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参保概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雇佣需求。接下来,我们从企业类型、规模和行业角度考察了缴费率下降的异质性影响。

第一,我们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进行行业维度的异质性考察,结果在表7的Panel A部分汇报,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行业维度异质性。正面影响对于制造业企业非常显著,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社保参保8.3%,增加雇佣职工人数为10.3%。对于服务业企业,对企业参保和雇佣人数均未发现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原本社保参保缴费行为较为规范,也可能因为制造业企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缴费率变化显著影响企业用工成本,进而企业行为对于缴费率的变化更为敏感。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当期社保缴费率下调将显著利好于制造业企业,同时在社保相关政策制定和改变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行业也应该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所在。

第二,表7的Panel B部分报告了按照企业规模分类的异质性结果,根据其职工人数定义其规模,职工人数不到200人的企业定义为中小规模企业,超过200人的定义为较大规模企业。^①不难发现,缴费率下调对大型企业或中小型企业社保参保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由于不同企业规模原有社保缴费率存在差异,控制组中小规模企业平均社保缴费率为57%,控制组大规模企业平均缴费率为78%,意味着缴费提高社保参保的幅度分别为7%与5.4%。此外,缴费率下调带来的就业增加效应仅局限于中小规模企业。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中小企业逃避社保的行为由来已久,是社保基金维持平衡的关键所在。如何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稳就业、保增长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中小企业正是这些问题的重心所在。

第三,表7的Panel C部分报告了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异质性结果,分为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对各类型企业社保参与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社保参保的影响对民营与非民营企业影响程度相似,就业增加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缴费率下降所带来的社保参保提高与职工人数增加效应在不同组别间均存在影响,其对于企业雇佣职工人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制造业企业、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

^① 若使用其他规模大小定义方式,例如企业雇佣人数中位数或平均数等,异质性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意味着降费统筹政策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分地迸发。

表 7 异质性检验

Panel A: 按企业所属行业分类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	(2)	(3)	(4)
<i>Treat_post</i>	0.0829 ^{***} (0.00571)	-0.0147 (0.00987)	0.103 ^{***} (0.0143)	0.0204 (0.0212)
观测值	459753	269290	458960	262731
R ²	0.654	0.764	0.923	0.936
Panel B: 按企业规模分类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中小规模企业	较大规模企业	中小规模企业	较大规模企业
	(1)	(2)	(3)	(4)
<i>Treat_post</i>	0.0402 ^{***} (0.00617)	0.0423 ^{***} (0.00827)	0.0627 ^{***} (0.0127)	-0.00976 (0.0128)
观测值	615314	155833	611952	151231
R ²	0.748	0.551	0.924	0.888
Panel C: 按企业所有制分类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log)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1)	(2)	(3)	(4)
<i>Treat_post</i>	0.0365 ^{***} (0.00969)	0.0543 ^{***} (0.00607)	0.0834 ^{***} (0.0203)	0.0515 ^{***} (0.0157)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 f(t)</i>	Yes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30185	440962	328962	434221
R ²	0.791	0.674	0.946	0.927

注:Panel B 部分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定义企业规模,职工人数 200 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中小规模企业,超过 200 人的企业定义为较大规模企业;若使用其他规模定义的方式(例如企业人数的平均数或中位数等),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二)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我们继续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和用工成本的影响,利用数据库中的“全年工资薪酬总额”除以职工人数获得“职工平均工资”指标,利用“全年工资、福利支出和社保缴费支出”总数除以职工人数获得“平均用工成本”的度量指标。回归结果在表 8 汇报,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缴费率下降对于企业总薪酬支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列 1),但是却显著降低了平均职工工资约 7.2%(列 2),同时也显著降低了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列 3)。

表 8 社保费率下降与职工平均工资

	薪酬总额	职工平均工资	平均用工成本
	(1)	(2)	(3)
<i>Treat_post</i>	0.00375 (0.0157)	-0.0723*** (0.0119)	-0.166*** (0.011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Baseline control * f(t)</i>	Yes	Yes	Yes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观测值	718841	718757	640723
R ²	0.918	0.729	0.763

注:列(1)“薪酬总额”为企业全年工资薪酬支出总额,列(2)“职工平均工资”为薪酬总额除以职工人数得到的数据,列(3)“平均用工成本”为工资、福利支出和社保缴费支出除以职工人数得到的数据。

这一结果意味着社保缴费下调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平均用工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这与文章的逻辑相契合,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缴费率下调会显著降低职工平均工资呢?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缴费率下降使得企业用人成本下降、扩大招工规模,进而使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和研发。但是在这其中,企业由于缴费率下降而新雇佣的劳动力可能大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较低,因此降低了所有职工的平均工资。换言之,劳动力成本下降使得企业使用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这种变化在短期内或许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效措施,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的经济发展新阶段下,使用低技能劳动替代资本与研发的空间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当然,这其中的更多事实、机制和政策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更全面和细致的探索。

八、政策性含义与总结性评述

本文以浙江 2012 年社保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从企业社保参保与社保支出的视角来看,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约 4.2%,且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2)从企业招工规模视角来看,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员工规模约 5.6%。(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缴费率下降所带来的社保参保提高与职工人数增加效应在不同组别间均存在影响,其对于企业雇佣职工人数的影响在制造业企业、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4)进一步分析表明,缴费率下降显著降低了平均职工工资,也显著降低了平均用工成本,这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

社保费率下调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特别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16% 的省份,可降至 16%。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提振经济活动或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发现具有几方面政策含义:第一,本文稳健地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且显著提高了企业缴费总支出。换言之,由于参与率的提高,降费政策并未减少社保基金的收入,这意味着当前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第二,研究发现降低缴费率显著调了企业员工规模,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企尤其明显。上述结果意味着在当前经济转型和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降费统筹政策的确实实现了稳就业、增

信心的预期,同时也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分地迸发。第三,值得指出的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缴费率下降对于企业总薪酬支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却显著降低了平均职工工资。这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这种变化在短期内或许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效措施,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的背景下,使用低技能劳动替代资本与研发的空间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在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下,本文结论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下新一轮全国层面执行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参考文献

- 白重恩,2019:《中国经济何处破局:养老保险降费》,《中国经济报告》第1期。
- 封进,2013:《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经济研究》第7期。
- 封进,2014:《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视角》,《金融研究》第7期。
- 封进、张馨月、张涛,2010:《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导致社会保险水平的下降:基于中国省际差异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1期。
- 高培勇、毛捷,2013:《间接税收优惠的规模,结构和效益:来自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景鹏、郑伟,2019:《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经济研究》第6期。
- 刘军强,2011:《资源、激励与部门利益:中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的纵贯研究(1999—2008)》,《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马双、孟宪芮、甘犁,2014:《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
- 毛捷、赵静、黄春元,2014:《增值税全面转型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来自2008—2009年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第6期。
- 唐珏、封进,2019:《社会保险征收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基于企业缴费行为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唐珏、封进,2019:《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究》第11期。
- 王伟同、李秀华、陆毅,2020:《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 杨国超、刘静、廉鹏、芮萌,2017:《减税激励、研发操纵与研发绩效》,《经济研究》第8期。
- 赵健宇、陆正飞,2018:《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经济研究》第10期。
- 赵静、毛捷、张磊,2016:《社会保险缴费率、参保概率与缴费水平——对职工和企业逃避费行为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
- 赵耀辉、徐建国,2001:《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第1期。
- 郑春荣、王聪,2014:《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管机构选择——基于地税部门行政成本的视角》,《财经研究》第7期。
- Angrist, J. D., and J. S. Pischke, 2008,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iley, C., and J. Turner, 2001, "Strategies to Reduce Contribution Evasion in Social Security Financing", *World Development*, 29(2), 385—393.
- Fan, Z., and Y. Liu, 2020, "Tax Compliance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Firm Responses to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6, 1—17.
- Gentzkow, M., 2006, "Television and Voter Turnou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3), 931—972.
- Jacobson, L. S., R. J. LaLonde, and D. G. Sullivan, 1993, "Earnings Losses of Displaced Work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4), 685—709.
- Kugler, A., and M. Kugler, 2009,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ayroll Tax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7(2), 335—358.
- Kodama, N., and I. Yokoyama., 2015, "How the 2003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 Reform Affects Firm Behavior", Working Paper.
- Liu, Y., and J. Mao, 2019, "How do Tax Incentives Aff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1(3), 261—91.
- Nyland, C., R. Smyth, and C. J. Zhu, 2006, "What Deter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Employers Will Comply with Their Social Security Oblig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level Data",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0(2), 196—214.
- Nyland, C., S. B. Thomson, and C. J. Zhu, 2011, "Employer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Insurance Compliance in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64(4), 73—98.

The Effect of a Red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on Enterprise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and Labor Employment

SONG Hong^a, FENG Jin^a and YANG Wanyu^b

(a: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b: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Economic Research,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The red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easing enterprises' financial burden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a reduction in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on firm's behavior has important academic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 large strand of the literature has examined th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high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in China, but only few have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reduction polic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 reduction in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on a firm's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and labor employment. In particular, we focus on the policy that reduced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in 2012 in Zhejiang Province. We use representative data (the National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5,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cluding enterprises above the scale as well 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sampled. We us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We obtain several findings. First, the de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firm's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and increases the total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of reducing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achieves a win-win scenario by 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i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Second, we find that the reduction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this effect is especially stro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Third, we further find that the declin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otal wage expenditure of enterprises,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s employee's average wag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mployment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at the focal stage may be mostly driven by the increase in the low-skilled labor force.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most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a single outcome,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or employment, and few examine both payment and employment behavior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on enterprises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and investigation along multiple dimensions will allow us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s effect.

Second, most studies use data at the regional level or on enterprises above a designated size or listed companies. These datasets largely ign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faced more difficulties and demands for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decade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listed companies 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lso have more incentive to evade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The dataset we use in this paper not only includes enterprises above the scale, but also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as a consequence, our analysis may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novel evidence on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rd,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udies the effect of a high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rather than the effect of a reduction in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in China, and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period before 2010. Since 2015,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mall reductions, and the nationwide reduction that came into effective on May 1, 2019 is the most drastic.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red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2, and the research time period is between 2007 and 2015.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more distinct and direct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can also provide policymakers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insight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latest round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reductions implemented from May 2019.

Keywords: Reduction in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Enterprise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Labor Employment; Wage

JEL Classification: H32, J21, J23

(责任编辑:晨 曦)(校对:晓 鸥)